

以高度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 舒乙 张杰芳

在弘扬共同价值追求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根脉、价值体系等的坚定把握。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层意义,在于引导各族群众正确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深刻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在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中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把握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

文化自信首先来自对中华文明历史根脉的深刻认知。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形成了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文明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文化既有自身特色,又共同汇入中华文化的浩荡长河,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形态和深厚底蕴。

从历史深处看,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风雨而始终延续,在于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包容力和再生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引导各族群众从中华文明发展史中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必然,深刻认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形成、文化凝聚、命运相连的有机整体。

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更要善于从本地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建设、共同发展的历史实践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无论是村寨中的互助传统,还是节庆礼俗中的情感交融,无论是生产生活中的相互依存,还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的携手奋进,都生动说明各民族早已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把这些鲜活历史和现实故事讲好,本身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

文化自信不能只停留在对历史的追溯中,还要落到现实价值的凝聚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够跨越地域,形成稳定而深厚的精神联结,关键在于各族群众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共同的情感归属。没有共同价值作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容易停留在概念层面;有了共同价值作引领,各族群众才能在国家发展、社会生活和个人奋斗中找到更加稳固的精神坐标。

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校教育、基层治理、公共文化服务和群众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在青少年教育中讲清楚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在社区治理中培育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在公共文化活动中增强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共同表达、共同分享的体验。价值认同是在长期耳濡目染中慢慢沉淀下来的,高度文化自信所支撑的价值认同,还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把握中,三者是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把这些文化资源讲深、讲活、讲到群众心里,才能让各族群众更加真切地认识到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们共同的身份归属。

在民族工作实践中,还要准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尊重各民族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重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并将其置于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予以理解和展示。这样,民族文化的独特之美才能转化为中华文化的整体之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在宣传阐释、教育引导和文化传播中,要更多运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能共情的表达方式。通过典型人物、家国故事、地方实践、文艺作品和公共文化活,把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经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悬浮在生活之外的概念,而是体现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具体场景中。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支撑

文化自信最终要落实在文化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停留在理论阐释层面,还要通过文化建设、公共服务、基层治理和现代传播等方式不断转化为现实力量。只有让文化资源活起来、文化

活动热起来、文化认同强起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会更加稳固、更有生命力。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结合起来。传统文化是滋养现实生活、联结各族群众的重要精神资源,通过非遗传承、文旅融合、校园教育、村寨文化活动和数字化传播等方式,让各族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文化实践中了解中华文化、亲近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特别是在贵州民族地区,更应把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载体,让各族群众在共同欣赏、共同创造、共同分享中增进情感联系。

把公共文化服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工程,也是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重要渠道。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及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都可以成为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空间。尤其在民族地区,公共文化供给不能只满足于有场所、有活动,还要注重内容质量和情感温度,让各族群众愿意来、坐得住、有共鸣,在共同参与文化活动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情感认同。

提升文化传播能力,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理、学理和情理讲得更加生动。当前,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变化,青年群体的接收习惯也在不断变化。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既要有理论深度,也要有表达温度,要善于运用短视频、微纪录片、融媒体产品、沉浸式展陈、网络文艺等形式,讲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故事,传播方式越贴近群众,文化认同越容易转化为情感认同和行动自觉。

以高度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文化建设相互贯通的重要命题。文化自信越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根基就越深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牢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就越坚实。面向新征程,要坚持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传承发展中华文脉中增强文化认同,在弘扬共同价值中凝聚精神力量,在推进文化创新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推动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共同现代化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互嵌式发展调查研究——以六盘水市为例》阶段性成果。)

构建贵州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路径选择

□ 何嘉祺 杨正军

贵州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内在逻辑

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作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承担着价值引领、理论武装、道德涵养等多重功能。贵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将其系统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不仅能为思政提供鲜活案例与厚重底蕴,还能通过情景教学、实践研学等多元路径,使红色基因从历史深处走进青年心间,切实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亲和力与实效性,推动形成“化风育人”的生动局面,进而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质效。

从思想内涵上看,贵州红色文化与“大思政”育人价值目标高度契合,共同筑牢理想信念根基。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核心任务是立德树人,旨在培养拥护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贵州红色文化蕴含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人民至上、团结统一等精神特质,与思政教育的导向高度一致。

从实践层面上看,贵州红色文化为高校“大思政”育人提供了具象化的载体与情境化的路径,提升育人实效。高校“大思政”育人要依托具体实践载体,增强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贵州红色文化拥有丰富的实践载体,如遵义会议会址等具象化的革命遗址,以及革命文物等物质载体,这些载体为思政育人提供了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实践平台。高校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观红色遗址、开展红色研学、宣讲红色故事等实践活动,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红色精神,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情感认同和行动自觉。同时,贵州红色文化中蕴含的实践精神,也与高校“大思政”育人注重实践育人、强化知行合一的要求相契合,能够有效推动思政育人从理论走向实践,提高育人效果。

从时代要求上看,贵州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是对新时代文化自信培育和红色基因传承任务的现实回应。新时代,青年学生面临多元文化的冲击和价值观念的碰撞,更加需要强大的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是新时代赋予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将贵州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有助于在青年学生中强化历史记忆、增强政治认同、提升文化自信。

贵州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构建路径

为推动贵州红色文化有效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需从课程、实践、保障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科学可行的融入路径,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优化协同保障机制,强化师资与制度支撑。巩固贵州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成果,需要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支撑和系统化的制度体系保障。在师资队伍方面,应加强思政课程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的红色素养培训,定期组织教师前往贵州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研学。同时可以邀请红色文化专家、党史研究者开展专题讲座,提升教师解读、传播与转化贵州红色文化的能力,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在制度建设方面,学校层面可成立红色文化育人工作领导小组,将贵州红色文化融入“大思政”育人工作纳入年度计划与考核评价体系,明确融入目标、内容、责任分工和考核评价标准,建立常态化督查与反馈机制,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的工作格局,助力贵州红色文化育人工作常态化长效、走深走实。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贵州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贵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研究生思政课程教学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2025YJSJGX004)、贵州省教育厅2026年度思想政治教育课题《贵州长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教学》、贵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贵州长征红色文化赋能高校“大思政”建设研究》(项目编号:GDGJYJ2025018)、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武汉东湖学院)专项研究课题《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新时代高校思政实践教学研究》(课题编号:WHDHSZZX2025382)、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阶段性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精神价值,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推动非遗的传承发展,在当代社会面临着从“抢救性保护”向“活态化发展”的范式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非遗呈现出三个关键面向,即以“民众”为核心的主体性参与,以“乡土”为根基的文化空间维系,以及以“品牌”为路径的现代化创新。如何实现民众的主体自觉、尊重乡土的文化生态、并借助品牌策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这三个面向的平衡点,也是推动非遗在当代社会的可持续传承与发展的圭臬。

民众:非遗的主体性与参与性

民众是非遗的“主体”。非遗区别于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在于其“以人为本”的活态特性,是内化于民众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的实践过程。无论是民间传说、传统技艺,还是节庆仪式,其生命力都源于民众持续的身体力行的参与和口传心授。因此,任何脱离了民众主体性的传承发展措施,都可能使非遗沦为空洞的表演或博物馆中的标本。笔者认为,真正的保护,应致力于激发民众的文化自觉,保障其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权利与能力,让传承发展成为基于内在认同的主动选择。

民众的“参与”是非遗活态传承的前提。鼓励民众参与并不意味着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更需关注整个社区或群体的集体实践。通过建立社区博物馆、开展民俗活动、组织技艺培训等方式,增强民众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文化氛围。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能够使非遗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调适,保持其文化特色及内在活力。

非遗传承,关键在“活态”。与博物馆里的文物不同,非遗不是历史的标本,而是仍然在民间社会中传承、演绎、变化的“活态遗产”,其承载着各族群众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和情感纽带。非遗与家庭、村落密不可分,例如传统村落的文化实践,正是非遗发生和传承发展的原生形态。因此,传承发展非遗,首先要尊重其“民众主体性”,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关系网络。

乡土:非遗的重要空间语境

“乡土”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融合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与社会关系的复合文化空间。大多数非遗项目,如农耕技术、地方戏曲、饮食习俗等,都深深植根于特定的乡土环境之中。“乡土”为非遗提供了不可或缺或“上下文”,是理解其意义与价值的钥匙。

一方面,“乡土”是非遗的“物质基础”与“灵感源泉”,特定的气候、物产决定了当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智慧,进而塑造出独特的文化表达。例如,江南水乡的船点制作、西北高原的信天游民歌,都与其地域环境密不可分。传承发展非遗,必须关注其所依托的乡土生态。另一方面,“乡土”是非遗的重要“社会容器”与“认同纽带”,传统的村落、集市等公共空间,是非遗展演与传承的重要场域,这些空间中的互动、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非遗得以存续的社会基础。任何非遗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一定依托于某个具体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文化生成的土壤、文化展演的舞台和文化存续的依据。

因此,推动非遗传承发展应纳入乡村振兴的整体战略,通过修复文化空间、振兴传统社区,为非遗营造一个可栖息、可生长的环境。

品牌:非遗的现代转化与市场路径

在消费社会中,“品牌”作为一种识别系统与价值承诺,成为传统文化连接市场的有效媒介。将非遗打造为“品牌”,并非简单的商业包装,而是通过挖掘其文化内涵,赋予其当代审美与功能价值,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全域旅游背景下,非遗完全可以被打造成文化品牌,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如贵州的“村超”“村BA”从民族地区的乡村赛事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游客与当地群众共同参与的“村字号”品牌活动。

“品牌”对于非遗的价值传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提升“可见度”与“辨识度”,通过品牌叙事,可以将传统技艺转化为易于传播的故事,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其二,创造“经济价值”与“可持续发展”动力,成功的非遗品牌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反哺传承发展工作,形成“保护—生产—传承”的良性循环。其三,重塑“文化认同”与“文化表达”,品牌的构建必须坚守非遗的核心价值与真实性,以“守正”为前提进行“创新”,这意味着需要在“原真性”与“现代性”“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确保品牌的发展始终服务于非遗的长远传承。非遗品牌的构建应是一种“主位”与“客位”的良性互动——既要满足游客的体验需求,更要尊重民众以文化主体性,将非遗作为有生命力的品牌予以保护、传承和推动。

当今的“遗产热”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包括文化认同、经济发展甚至商业驱动等密切相关。非遗作为一种“活态历史”,需要在特定语境中进行“灵活解释”,既要保持其本色,也要回应时代变化。

“民众”“乡土”与“品牌”构成了非遗在当代传承发展中缺一不可的三个面向:“民众”是非遗的“灵魂”,决定了其存续的根本动力;“乡土”是非遗的“根基”,提供了其生长的原生土壤;“品牌”则是非遗的“翅膀”,助力其融入现代社会。三者之间应是协同共进的关系,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乡土文化的振兴便无从谈起;缺乏乡土文化的深厚滋养,品牌化的非遗难以体现真正内涵;如若忽视品牌化的培育路径,则可能使扎根乡土的民众实践面临边缘化的挑战。

未来的非遗传承发展工作,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三位一体”的系统观,强化民众的主体地位,激活社区内生力量;守护乡土文化生态,留住文化的根脉;勇于探索品牌化的创新之路,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新的生机。只有实现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协同实现,才能真正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贵州省民族研究院)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三重向度

□ 郑育艳

深刻认识贵州红色文化的内涵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红色文化作为贵州精神的重要源泉,始终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深入理解贵州红色文化的内涵,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加以把握:一方面,贵州红色文化是具象化的物质载体,表现为一系列可触可感的革命遗存,包括遵义会议会址、四渡赤水纪念馆、黎平会议会址等革命遗址遗迹,以及革命文物、文献档案、烈士陵园等实体资源,都是红色历史的无声见证者;另一方面,贵州红色文化既包含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也融入了贵州各族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甘于奉献的精神。贵州红色文化以其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核的有机统一,共同构筑了独特的教育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历史传承看,贵州红色文化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源。从时代价值看,贵州红色文化是具有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引领发展的现实作用,是新时代高校建设“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